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汉译精品

思想人文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孙传钊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汉译精品·思想人文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孙传钊 译

Elisabeth Young-Bruehl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美]布鲁尔著;孙传钊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06
(汉译精品.思想人文)
ISBN 978-7-214-05879-9

I. ① 爱… II. ① 布… ② 孙… III. ① 阿伦特, H. (1906~1975)-传记 IV. ①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733 号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Copyright © 1982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356

书 名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
著 者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译 者 孙传钊
责任编辑 王翔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20.375
字 数 626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79-9
定 价 4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第二版序

2003年秋,在新英格兰的一所大学里,我向广大师生听众讲述了我特别喜爱的、关于汉娜·阿伦特的一件趣事。1969年,就在阿伦特开始在纽约的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不久,一大批抗议越南战争的学生(包括我在内)征求她的意见:我们是否应当与当地的一个工会合作来举行一场反战游行示威。阿伦特先是仔细聆听我们所有的正反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用她那浓厚的德国口音简洁地告诉我们:“很好,那意味着你们可以使用他们的油印机。”当我讲述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正当学生都还听得起劲却又感到困惑的时候,听众中有一部分年长的教师(与我同时代的人)已经因为这个伟大政治理论家的实用性例子开始发笑了。后来,有一个“新人”——阿伦特总是那样称呼学生的——走到我面前,为这次让她受到鼓舞的讲演向我致谢。她说:“对我而言,去理解汉娜·阿伦特让我望而生畏。”然后,她又一本正经地向我问道:“油印机是什么东西?”

汉娜·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七年后,也就是1982年,自从这本汉娜·阿伦特传记首次出版以来,新一代读者已经崛起。这批新读者现今正利用移动电话、电子邮件等手段来组织反战示威,并且还学会在一个与阿伦特当时所生活的世界迥然不同的环境中,用政治目光去思考与行动,——尽管现在的环境是由阿伦特那时的世界演变而来。假如现在让我写这本传记的话,我一定会考虑这个新语境,传记的内容也将包括“新人”在内的20世纪中期发生的政治事件,这样才能完整地叙述阿伦特所逼近的政治。然而,那些事件已经是“远古的历史”。——读者要理解和探索的世界,是苏联解体后的唯一的世界。

有时候,我也曾考虑过要修订《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这本传记,以

适应当前情形和年轻读者，^①但是，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觉得还不如让它保持第一版的原貌，因那样才能显示出那个世界中汉娜·阿伦特的生活及其体验，才能在她的生活结论中读到她所看到的世界和作出的判断。我曾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未来世代的人们，依然要对这个生命作出判断。作为传记的作者必须做出的判断，只是判定：是否应该讲这个故事？”阿伦特逝世后，对她的生涯判断已经有了新的开始，在这里，我也想对那些判断中的一部分仔细地考察一下。我也愿意帮助那些可能会分享阿伦特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可能会分享她“爱这个世界”的那些年轻读者，因为他们太年轻，所以未曾直接接触过阿伦特；虽然有些读者的年龄与我相仿，然而，当时我却有幸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就是在这个学院，我最终是在阿伦特的督促之下，完成了研究她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学说的博士论文。

就像阿伦特的学生以及在美国与欧洲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样，我需要从她那里学到如何去思考越南战争中层出不穷的事件以及全世界对这场战争的反应、由此引申出对政治运动的深思。我打算将传记写成这样一本读物：让读者们知道阿伦特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在世的评论家；同时，这篇第二版的序言将会引导大家了解阿伦特在她逝世后的三十年内是如何成为一位历史人物的。^②

写这本传记的时候，我首先是从考察阿伦特故后的出版物着手的，她的大多数“学术不动产”对我来说都是有益的。自从1978年《精神生活》——这本她生前尚未完成的著作问世以来，阿伦特的大量珍藏作品都已经出版。这些作品主要分三类：书信集、未出版或未收藏的论文集（用德文和英文书写），还有她的《思索日记》（*Denktagebuch*）——这本学术日记也于2003年在德国出版，尽管内容很长（1500多页）而且价格不菲（120欧元），但首版还是畅销。虽然《思索日记》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具文献价值，但在写这本传记的时候，我还没有能用上。

阿伦特的论文总共有5卷，所有的这些著述都是由我的朋友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来保管，杰罗姆·科恩是一个思想深刻、博学的编辑，他也是阿伦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时的最后一个研究助手，现在是她的学术遗嘱执行人。1994年，科恩编辑的阿伦特的文集《理解评论集》（*Essays in Understanding*）出版。2003年，朔肯图书公司（阿伦特曾一度在这里担任编辑，并将弗兰

兹·卡夫卡介绍给广大美国读者)出版了阿伦特的《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这是科恩将阿伦特的篇幅很长的演讲手稿精心编辑而成的一本关于道德哲学原著的论文集。另外,有可能被命名为《政治哲学问题》(*Probl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文集也已经纳入出版计划,其中第三卷将是阿伦特论述马克思和其他重要学者的一部足以成书的手稿。按照计划,另一卷是收入精选自《思索日记》的短文的文集,还有一卷就是把阿伦特的关于犹太人研究的论文汇集起来的文集。

接下来,这几年内收集起来的书信集也很快同读者见面了,所以,读者将能读到阿伦特的全部信件(尽管信件现在有可能以国会图书馆阿伦特文书的编号版本存放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已出版的来往书信中,有阿伦特与她的良师益友、父亲般的人物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来往信件于1985年出现了德文版,1992年英文版问世,这些来往书信都已在20世纪中展示出来了。所有未来的欧美历史学家都会将眼光转向阿伦特对二战后美国的共和危机、对德国政治复苏及纳粹垮台后德国人民与“过去的统治”斗争所作的具体的、有深度的反思——而且具有显著的前瞻性。^③

《四堵墙内》(*Within Four Walls*, 2000)所收集的往来信件,是阿伦特与她那出生于柏林、工人阶级、自学成才、睿智且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之间超过三十五年时间伙伴关系的见证,同时也是他们之间贯穿终生的关于性爱、移民、文化适应、奋斗成功、病痛、失败以及对新世界的怀疑等等爱的对话典范。^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吕歇尔的哲学取向,可以从这些书信中窥见一斑,特别是他始终敬重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也是一名述而不作的教师)、他赞赏雅斯贝尔斯的世界主义哲学的洞察力,即与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些将文化历史上溯到“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的哲学家们之间可以开展对话这种远见的信仰,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哲学立场。但是,他们夫妇俩之间的往来书信最能说明的一点就是:阿伦特与布吕歇尔能够为他们的家庭进行彼此之间的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他们能够信赖对方的忠诚,可以对彼此的优、缺点保持正直的态度,还可以互相分享希望——给对方提供安全的“四堵墙”。

阿伦特同玛丽·麦卡锡之间的友谊,是通过两人对政治与文化解读,以一种富于机智、常常是尖酸刻薄而又喜欢饶舌的交流方式展开的。《朋友之间》

(*Between Friends*, 1995)是阿伦特的来往书信中最为“美国化”的书信集,这本书对于研究美国 20 世纪文化生活的学生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读物。然而,她与她的主要的友人——至今仍然不太为人熟知的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以及与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之间的往来书信,很可能不久也要被翻译成英文,将冲破德国学术界的围墙,在域外找到读者。^⑤

对我来说,在写这本传记的时候,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之间往来的信件、阿伦特与布吕歇尔之间的信件中的大部分(去掉一部分后来出现的战前信件)、阿伦特保存的与玛丽·麦卡锡之间的信件,都为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虽然那个时候,我阅读了阿伦特的“不动产”以及在马尔巴赫的德国文献档案馆中所有可用的信件,但我还是未曾搜集到布洛赫与布卢门菲尔德的信件。现在,这些信件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了,以后给阿伦特写传记的人就能够比较全面地描述她同别人的友谊,但是,我想这也不会为她的故事增添任何更重要的实际要素。

现在我已经读完了阿伦特与麦卡锡两人的往来信件,所以我已经清楚了他们的友谊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这种友谊的本质是什么。阿伦特总是有一个最好的挚友。童年时期,还是大约十来岁的时候,在柯尼斯堡认识的安妮·门德尔松成了她最好的朋友;阿伦特迁居到美国后,她一有机会重回欧洲,马上就恢复了同安妮·魏尔的关系,但是,在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情人希尔特·弗伦凯尔还是成了她的知己。1950年,弗伦凯尔死于癌症,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阿伦特转向了同玛丽·麦卡锡——阿伦特感到有亲和力的第一位美国女性——的友谊。虽然麦卡锡比阿伦特小六岁,但她却具备阿伦特对朋友所需要的品质(阿伦特已经在丈夫那里发现了这种非常特别的品质):充满观察和判断世界的激情——既包括他们面临的直接社会现实,也包括范围更大的政治领域——情感丰富、心思细腻而又不多愁善感;具备敏锐的才智而又不夸夸其谈、自作聪明;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对朋友忠诚并明白友谊是如何使那些无家可归、没有他人关心、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找到心灵归宿的。

阿伦特可能也断定麦卡锡会像自己年轻时那样(因此可以告诉麦卡锡该如何去解决这种事情)卷入同男人之间的感情漩涡中,实际上,自从她 35 岁嫁给布吕歇尔并且致力于写作以后就已经不存在也不需要情感纠葛了。对麦卡锡来说,阿伦特就是她的一个能将自己卷入麦卡锡风流事件中但又从来不会

离开书桌的知己——几乎是她的犹太人母亲，当然更像是年长的姐姐。同时，对于阿伦特来说，她有可能将自己已经放弃的那种小说写作、声誉、文化沙龙、政治激进主义的生活委托给麦卡锡去实现，结果是她换来了活泼的文学界、文学见解等方面的养料。在给麦卡锡的信中，阿伦特感觉自己在遭受挫折与压抑时期形成的苦闷心情完全得以释放，感觉可以在信中自由表达自己多么渴望成为一个普通的女人或朋友，而不仅仅是渴望成为一个名人或一个学术成就比自己的圈内其他人更加出色的人。同时，作为一个旅行者和作家的麦卡锡的欧洲化程度，足以赏识政治上美国化而文化和意识上却是欧洲世界主义的阿伦特。1970年，布吕歇尔逝世，当时雅斯贝尔斯也已经离开人世，在此后的岁月中，麦卡锡能够深刻体会到朋友的悲伤并在友谊上主动为她提供“四堵墙”。

阿伦特于1925—1975年间和她的情人兼导师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来往书信——1999年已经出版德文版，2004年才出现英文版——完全不同于其他已经出版的他们间的书信。^⑥这些信件在海德格尔死后不久——1976年，海德格尔在仅仅距离阿伦特逝世没几个月也离开了人世——也随之被尘封在马尔巴赫的德国文献档案馆中，所以，在我写有关阿伦特同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特别是关于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时，我不得不依靠与那些少数知道此事的人交谈，或与了解战后他们之间关系是如何恢复、发展的人交谈，才得以知晓。结果，我的传记低估了海德格尔在战后1950年与阿伦特再次见面以及从1960年代末一直到他们生命结束这段时间——也就是阿伦特写《精神生活》期间——在她学术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当然，我的传记也没有考虑自他们离开人世后，学术界围绕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的争论长期延续，而且，依靠已经出版的书信也未能解决这种争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汉娜·阿伦特现在已经无法割断与马丁·海德格尔的联系。

这些已经出版的海德格尔的书信集，并不像其他书信集那么完善。相对来说，海德格尔的大多数书信中，几乎没有阿伦特写给他的信。从他们在马堡大学(1925—1927年)感情纠葛开始，也就是海德格尔写他的鸿篇巨制《存在与时间》的时候，那个期间阿伦特的信件已经遗失，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她用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情感经历。1950年——也就是海德格尔因为曾是纳粹党派分子以及人们谴责他在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趋炎

附势于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所以仍不能取得任教资格的时候——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战后第一次重逢。之后，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写了很多信，但阿伦特给他的回信只有少部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只有1967年后的书信才能够派上用场。周密细致的出版书信集编辑乌尔左拉·卢茨(Ursula Ludz)为这本小说集做了足以独立成书那样篇幅的大量注释，其中许多注释他都参考了阿伦特的著作以及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布吕歇尔之间谈起海德格尔的书信，由于海德格尔从未写过一句关于阿伦特的公开的文字，所以乌尔左拉·卢茨不可能在海德格尔的叙说中找到任何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这本小说集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出版时，附上了言及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丑闻的前言。这个丑闻是由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阿丽斯贝塔·爱丁格(Elzbieta Ettinger)教授刻意创作的。此前，在写一篇简短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二人传记时，她获准可以研读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通信，但是被规定只能引用阿伦特单方面的信。^⑦所以，1995年爱丁格的《汉娜·阿伦特/马丁·海德格尔》(*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出版之后，加上我曾经在这本传记中披露过两个人的感情纠葛，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在1920年代是情人关系的事实也就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如我注释所表明的那样，我的这本传记是立足于与阿伦特那些朋友的交谈以及参考阿伦特书信中关于此事的蛛丝马迹，特别参考了她写给自己丈夫布吕歇尔的信，事实上，在193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36年8月8日)，阿伦特向丈夫表达了自己将会毫不犹豫、不畏流言蜚语，从而完全可以做到“待你如待己”的信心。——他们俩在一起的第一个月，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此事。

然而，尽管爱丁格有幸利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书信，但她笔下对他们俩的这段情感描写，却仍然滑稽可笑。她向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天真烂漫、无助的犹太女学生与一位迷人但又残忍无情、信奉天主教的已婚男教授演绎的一段充满激情、冲动、背叛、为忠诚而卑躬屈膝的情感戏。她笔下的这个从来都不能超越浪漫而成长的汉娜·阿伦特，即使成为遭人耻笑的女人，她最终还是在偏执于“毫无疑问的忠诚”中屈辱地活着。对于自己年轻时的这段风流韵事，她不仅向丈夫隐瞒了50多年(P. 42)，而且将海德格尔的一切过失都归咎于他的妻子，同时，还充当了海德格尔的辩护者(“她为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去洗刷他的纳粹历史”P. 78)和海德格尔所期望的“心灵补偿大使”(“阿伦特接受了这

项重任”P. 74),所以只能做出令人愤慨的弱智判断。爱丁格用了成百上千的“看起来”、“可以想象”以及“她一定觉得”等词语来为自己的估计大做文章,从而使她作为一个传记作者蒙上了这样的嫌疑:已经把自己的故事及写作主题陷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中去了。实际上,优秀的传记人物研究的特征,就是决不发生与主题对话的现象。^⑧

这篇荒诞的文章(阿伦特的昔日朋友,也就是文学批评家阿尔弗莱德·卡津将这篇文章冠以“最有价值”的美名)使那些对阿伦特充满敌意的人无不窃喜,并不足以为奇。实际上,对阿伦特充满敌意的人数不胜数,尤其是在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发表后的几年里,由于该书激起了20世纪其中一场最广泛、最难解难分的论战,所以更加使她在学术界中树敌无数。另外,对于那些一直都认为阿伦特判断力极强的人来说,正是由于这些他们无法看到的绯闻书信——认为这篇荒诞的文章也许掌握了确实证据——才令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只能感到伤心不已,却又不能给予有力的反击;被爱丁格从书信中断章取义、瞎编乱造后的这些言辞就如同污秽的流言一样让人百口莫辩。很显然,双方的学术财产遗嘱执行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不得不将他们的来往书信公开出版。

将这封信集与其他书信集区分开来的第三点,就是马丁·海德格尔——不像雅斯贝尔斯、布吕歇尔、麦卡锡、布洛赫以及布鲁门菲尔德等人——不可能会有分享阿伦特那种专注于世俗事情的兴趣,而且,专注于世俗事情这部分兴趣是她后来为了摆脱两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为治疗自己青春时期由于缺少世俗之心而受到伤害所发展起来的兴趣[这个兴趣自她师从雅斯贝尔斯之后便开始了,她曾惊异地向雅斯贝尔斯感叹:“您的哲学为我走向政治打下了多么好的基础啊!”(1949年3月11日)]。和其他与阿伦特通信的人不一样的是,海德格尔不是一个能够承担起责任和乐于行使判断的人。在德国人当中,他虽然是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但他不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典范。而雅斯贝尔斯是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正如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布吕歇尔的信中所揭示的那样,海德格尔的虚伪与表里不一以及分裂的自我,让她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结果再度发生的事情是,尽管阿伦特没有对海德格尔人格特性进行深入挖掘,也没有在后来将其视为是自己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所要塑造的角色,但

他的人格特性却成为阿伦特私人写作与公开的著作中的一个话题。汉娜·阿伦特从来都没有完全解开马丁·海德格尔这个谜团；即使是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阿伦特还是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再次探讨了他的问题，尽管她为纪念海德格尔 80 岁生日的论文集献上祝贺的文章（包括在信中表示祝贺）。^⑨

许多争论过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影响俩人身后声誉的评论家们，基本上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一方面，作为一名纳粹分子，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早先加入纳粹党并且从来都没有公开否定自己的决定或行为的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辩护者，因为在战后他们又恢复了关系，并且阿伦特还致力于促使海德格尔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另一方面，作为第一个与柏拉图踏上前往锡拉库扎辅助暴君狄俄尼索斯之途相似的人，海德格尔在判断与行为中的过失应当为人所理解与宽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敬仰以及在自己的著作中受其影响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问题在于哲学家是否为政治行动者曾经提供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他们的行为是否将（或应当）总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沉思的世界而不是属于赋予实际行动的世界？

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独立判断是随着战后岁月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写《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时——1950 年以前，她愤怒地将海德格尔视为欧洲的夙敌：一个典型的受“暴徒”引诱，但最终却因为这个暴徒群体对他丝毫不感兴趣从而将其孤立的那样的创新者。后来，当他们恢复关系之后，阿伦特尽力地站在哲学维度上将海德格尔解释成为一个分裂式的人物：他的一部分是天才，另一部分却是虚伪、胆怯；他时而（最坏的时候）欣赏阿谀奉承，以此为生活之本，时而（最好的时候）又以将学术谦卑作为自己的生活之本。阿伦特曾经与雅斯贝尔斯一起探讨过关于海德格尔是否能够克服他内心中的人格分裂问题；阿伦特决定耐心等待，而雅斯贝尔斯却毅然与海德格尔决裂（正如他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所表达的那样，雅斯贝尔斯将自己的这个决定也写进了他的自传中，该自传的德文版最近已经出版）。^⑩

最后，到了 1960 年代，在对海德格尔作品全面研究和与他的对话基础上，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开始有了不同于以前的理解。接着，她强调在 30 年代末期的时候，海德格尔已经在《尼采》第二卷中，追加了一个关于“意志并不会决定一切”的哲学论断，而不是论述自己作为纳粹党成员的政治变化。随着那种

“思维的转向”(Kehre),海德格尔用一种阿伦特在《精神生活》中所归结的方式——“当海德格尔试图向自己在纳粹运动中的短暂过去妥协的时候,在他看来,用来控制和支配的意志就是一种原罪”(vol. p. 173)——来谈论意志这个概念。

特别是由于阿伦特的《精神生活》让人感到晦涩难懂,所以,对于那些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对于那些美国和欧洲的哲学家们来说,他们至今都还没有领会出阿伦特在人生最后岁月中所写的哲学作品中值得关注的东西,从而也使人们并不是十分了解阿伦特对海德格尔评价的历史。但是,就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而激起的论战,却推动阿伦特朝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之路走去:即使在她受到人们尊敬的时候,关于她的判断问题,依然仿佛是一团阴影笼罩在她的身上。

事实上,人们对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这场争论,与另外一场关于继续影响她在思想世界中被人认可的争论——在阿伦特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激起的艾希曼之争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由于我在传记中详细谈到的、那些参与到1960年代这场艾希曼之争中的人,直到现在还坚持同一立场,所以在这里我对此不再加以评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参与论争的人已经有了变化了,但人们所持的论争立场却仍然不变;带着对各种新、旧形式的反犹太主义的恐惧,伴随着关于如何抗击它的固有理念,为艾希曼之争中一个不断重复的强迫性冲动煽风点火。这个顽固行为,已经造成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关层面的最直接的不幸后果,阿伦特关于对依照国际法进行审判的挑战所得出的结论性思考,几乎已听不到了——即使现在已经成立了国际法庭作为专门审查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国家犯罪机构。阿伦特曾写道:“法庭(在耶路撒冷)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在法律文本中找不到的犯罪行为,而且还是一个在任何法庭中——至少不会早于纽伦堡审判——都不可能理解的同样类型的罪犯。”^⑩

这两场关于阿伦特的判断而激起的论战,引起了人们质疑她是如何思考判断的,这也是她《精神生活》中未完成的“判断”部分将要讨论到的第三个课题。但是,在理解她的判断方式与她对判断的思考时,我们必须回顾历史来看一下她在美国写作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判断是如何导致这些论争的。汉娜·阿伦特总是能够激起人们的强烈反应与激烈的批判。我想,这恐怕既是因为她的思考与判断方式,也是因为她实事求是的言论——而且这种言论本身又

常常被辩论所掩盖了——才造成的局面，只是无法分出这两个理由孰轻孰重。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作为一个可怕的警告，阿伦特首次明确地指出自己最基本的思想。她认为政治——公众所理解的那种在一个被不同形式的政府所允许并受到法律保护公共空间这样的“小范围”中自由发表言论和自由行动——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她认为政治有可能会消亡。她进一步地认为，改变由于政治的彻底消亡所带来的极大矛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和作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统治12年下的幸存者，这是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到的认识）。像暴政一样，极权主义这个在不同国家下的新奇事物，并不是像暴政那样简单的政治衰退；它通过将人的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这样的手段，有组织地首先在小范围消灭单独的人性并最终扩大到消灭全部人性，进而从根本上来消灭政治。这就是极权主义“根本的恶”（radical evil）。^⑩

阿伦特思想中这个意义深远的呐喊，激怒了她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但他们采取了一种部分上和根本上有害的形式来攻击阿伦特。以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为例，阿伦特认为尽管两国在演进与意识形态根源上有着天壤之别，但两国的政体基本相同，实施的都是极权主义统治，随着开始卷入冷战之争，阿伦特的这一分析也招致了政治左派的怨言和政治右派的谩骂。

政治右派先是接受了阿伦特的分析，然后又扭曲了她的分析，因为当反极权主义不仅反对苏联，而且也反对作为意识形态——披上了反纳粹德国及其种族主义这种道德正义的外衣的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可能使其反共产主义得到有效的支持。1951年阿伦特的书出版后不久，她便意识到美国反共产主义的中流支柱就是那些曾经的共产主义分子（“前共产主义者”）。在他们新的忠诚中，他们僵化的思维模式仍然未变。这些“中流支柱”是一群随心所欲的思想理论家，他们可以在没有内心的挣扎下随意改变目标，他们的行动指令仅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争取民主对极权主义的胜利，他们可以不惜采取任何促进民主的手段——包括像极权主义者在面临城市目标时所采取的那种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来对付民众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从1950年代以来，这种禁止独立思考的智力模式已经构成了对美国国家政治生活最严重的危害：也助长为民主而战的“爱国”说教，形成了一种就像美国宪法传统

失常、甚至几乎不被认可的标准。

在左翼这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阿伦特既不考虑他们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是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背道而驰的那种思想，也不考虑他们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所进行的批判。这种左派思想，实质上已经使他们不可能去欣赏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要素和反政治过程的关注。这种关注使得极权主义要素已经明朗，或有可能使之更加明朗。从这一点上来看，阿伦特似乎是不能理解苏联的革命者们就是那些拥有社会正义、具有先见之明的理想主义者。

在写《极权主义的起源》时，阿伦特本人对马克思敬佩不已，她还将列宁与斯大林明确地区分开来。与她的左翼批评家不同的是，1950年代早期，阿伦特在兢兢业业地撰写《人的条件》和《论革命》时，更加稳定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阿伦特批判之旅刚开始的结论在《人的条件》一书中表露无遗：她将马克思描绘成论述劳动(labor)的理论家——不谈工作(work)或活动(action)；而且在《论革命》一书中，全文都贯穿了她对那些将“社会问题”凌驾于政治行动之上的、将法国革命原理强加在美国革命原理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猛烈批判。但是，或许在与雅斯贝尔斯的书信交往中，阿伦特的思想路径才是最毫无遮掩的，而且在信中，雅斯贝尔斯曾经鼓励阿伦特去重新考虑马克思本人。

他们之间的交流开始于1951年，当时，阿伦特高度赞扬了雅斯贝尔斯的一篇关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文章，而雅斯贝尔斯则回应：“你赞成马克思对于正义的热情，这使得他与康德联系起来……我看，马克思的热情的根源似乎不纯，根源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正义的，从人类不具有的消极印象引出其生命这个因素，就像希伯来诸多伪先知中的某一位可憎的姿态。”^③尽管雅斯贝尔斯对她说这段话，阿伦特还是为这个被她视为是一个真正理解她所说的（相当具有海德格尔式的用语）“商品经济将人和自然异化”的“叛逆者和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学者或哲学家的马克思进行了辩护。雅斯贝尔斯也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并且还列举了马克思的“褊狭、恐怖（如）其个性特征例子说明那段话：认为他与列宁有着不可打破的连续性……他很有可能天生就与路德一样，其思想远远没有其带来这些思想的个性特征更为重要。”此后，阿伦特继续执行了她阅读马克思的计划，并逐渐开始认同雅斯贝尔斯的结论，她说：“我读马克思的

作品越多，我就越发现您是对的。”在写《论革命》一书的过程中，阿伦特已经不但认同了雅斯贝尔斯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的批判，说：很明显，“马克思为社会问题所困扰，并且不愿认真关注国家和政府问题”，而且，她还对他的作为思想载体个性特征的重要性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认识。

写完《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的那段时间内，也就是阿伦特写一长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打算收入计划出版《政治哲学问题》里）期间，她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批判家，她还将自己对右派、对前共产主义分子以及麦卡锡主义分子的批判这样一个当务之急的任务搁置在后。与针对诸如犹太人群体的纳粹意识形态相比，促进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更多地影响了那种渴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挑战的力量。阿伦特认识的转变，也反映了她自己情感的转变：在经历多年恐怖之后，终于迎来了希望。但是，阿伦特并没有留下她作为思想载体的个性特征。相反的是，随着自身的改变，她已经开始能够更好地去欣赏和理解它。她知道，自己的著作已经将她在世界中丧失了家的感觉能力的那种深切恐惧和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她徘徊在自由和极权主义两个世界之间的时候，她只能恐惧地看待这个世界，而且她已经完全被恐惧击倒了。她的所有的著述几乎都是抗议那发泄在欧洲犹太人身上的一——对她的同胞的屠杀，以及抗议欧洲两代知识分子中的众多背叛者，也就是抗议意识形态上的左派、右派分子（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预谋的报复行为。

1948年，雅斯贝尔斯写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读了她的一篇关于集中营的文章，谈到她文章中那些非意识形态的、独立的、对现代的丰富体验：“是的，你生活中的恐惧——不是因为担忧你自己，而是因为担忧整个人类——使你对事物有清楚的认识。你已经看到了人们不想接受这些事实（关于集中营），将它们抛在一边，不理解它们，也不相信它们会存在于真实世界中的这些危险。你考虑到最后的逻辑结果。而且，你所揭示的东西确实可能使他们冷静下来。是的，你应该警告人们，只有用这种知识的策略才可能阻止这类事情‘再度发生’。”（p. 105）。

二战后，阿伦特的思想不断地走向成熟。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她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个性特征是如何包含那些愿望——部分地反映在相对她而言的政治左翼与政治右翼的观点之中。她希望能够将深度的保守性与激进融合在一起。这所谓激进，就是出于对新奇事物、新开端的爱所萌发的对世界及

其包含的一切自然与文化事物的一种冲动的呵护。对他人而言,这也许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愿望。然而,那些死守祖训从而完全沦为墨守成规的人,或是一边倒沦为革新者的人,为了对付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们总是以极端主义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正如阿伦特曾经总结的那样:“人对于变化的渴望,与他对稳定的需要总是能够相互制衡,而我们目前用以区分这两个派别的词汇,即改革派与保守派,恰恰预示了已经失序的局势。”因此,无论是从性格学还是从政治学角度来讲,人们对阿伦特及其冷战时期的典型作品的曲解,都反映了这个失衡的局势。

《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描绘方式,开始受到冷战争论的影响,而且这种方式使读者难以借用此书来追问除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极权主义变量。阿伦特本人在1966年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前言中,也讨论过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并且宣称难以对中国政权的性质进行判断,因为中国的政权“还处在变动的状态中”,这就明确地表示在中国也存在着许多极权主义元素,只是还没有一个能够解释其全部历史或全球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个能够解释其雄心的意识形态——一种能将极权主义政权与一党专政或暴政相区分的意识形态。她总结说:“控制一切是政权的唯一形式,在这种政权下,多党共存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去小心谨慎地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语”(p. xxvii)。

对于那些不再关注冷战的现代读者来说,阿伦特运用她对纳粹和苏联极权主义的探索来判断政治发展的这种实践,正作为一种典型而被他们效仿。特别是随着那种对世界秩序构成新的、后冷战威胁的滋长,阿伦特所证明的极权主义要素,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以一种新奇的变量开始引人注目;而且,许多当前的读者都将这个形势当作一个挑战——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一个新版本,预计在2004年出版,而且,此版本还特意包括了来自先前不同版本的所有序言。

为了说明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与当前世界局势的直接关系,我就简单地概述一下她认为是极权主义政权本质的几大要素。在她看来,极权主义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有一个能够解释其历史、判断其政权及政策性质的意识形态;它预示着统治阶级和内在的敌人(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阴谋)必须被

消灭。阿伦特描述了隐藏在纳粹主义里面的“自然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那里的“历史的”意识形态。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这些历史上的极权主义类型并不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两者都会以两个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那种对当前最有影响力的形式，也就是以道德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一方面，在当前的美国政治花言巧语中存在着可以观察到的意识形态，它也可能被称作主权民主的意识形态：一种信奉正统派基督教者的民主，在这种民主形式下，民主就是向世界鼓吹的德行、必要时再附加以暴力手段的德行。而且，对这种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的评论家，则被视为内在的敌人、不爱国的人。另一方面，在好战的穆斯林分子中，也普遍存在一种所谓“品德纯良”的意识形态，这不仅是对传统伊斯兰教的曲解，也是对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Wahhabist)教徒的曲解。我们现在见证的不是一个“文明的冲突”(如一些评论家认为的那样)，而是一个道德意识形态的冲突：两种极端的道德清教徒主义。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第二个重要要素，是完全的恐怖行动，她亲眼目睹了恐怖行动在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劳改营中的制度化过程。最终不放过任何一部分人这种完全的恐怖行动，在建立这些政权之前出现。总是必定要通过解构传统的等级结构和政治忠贞的方式发起一种炽热的“政治运动”——最终使得大量人口背井离乡和遭到流放看起来是必不可少的。她还指出，1945年原子弹和后来其他核武器的引入，将世界置于一种新形式的完全恐怖主义威胁之下，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各种形式中经历着这种恐怖，各种大大小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成为对国家、团体，甚至个人的有利工具。一切的完全恐怖现象都涉及消除普通民众与战争区域——这个无限制的暴力之间的界限。作为战场的城市与作为政治空间的城市势不两立，这也是而今我们正在世界各地的爆炸事件的环境中亲眼所见的事情。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要素的第三点是通过约束婚姻的法律(禁止那些被指定为上层等级的人与下层等级人之间进行通婚)和强迫人们监视、告发自己亲人的警察机关的活动来达到对自然人的控制——主要是对家庭的控制。随着极权主义政权下对公共空间的破坏——政治空间的破坏，接下来便是对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这个私人空间的破坏。当前普遍存在道德清教徒主义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该潮流意在家庭的延续，但却走极权主义之路，破坏政治过程，声称来源于世界伟大宗教传统，没有它保护的话，私人 and 家